

● 廖超慧 著

剖

POU

视

SHI

人

REN

生

SHENG

——
鲁迅与文化名人



鲁迅



胡

适



剖视人生

——鲁迅与文化名人

廖超慧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2 号

剖 视 人 生

——鲁迅与文化名人

廖超慧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安陆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20 千字

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418—0681—1/I · 212

定 价:4.98 元

4.98

4.98

目 录

一、“历史中间物”

- 中外文化撞击中的鲁迅 (1)
- (一) 鲁迅与传统文化 (2)
 - 1. 儒家文化 (2)
 - 2. 道家文化 (6)
 - 3. 佛教文化 (12)
 - 4. 三教同源及其他 (15)
- (二) 鲁迅与外来文化 (19)
 - 1. 进化论 (19)
 - 2. 个性解放 (26)
 - 3. 尼采哲学 (30)
 - 4. 摩罗诗派 (33)
 - 5. 马克思主义 (36)

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两极

- 鲁迅与胡适 (42)
- (一) “同是曾开风气人” (43)
 - 1. 对儒家文化的批判与吸纳 (44)
 - 2. 发难者与奠基人 (49)

3. 新文坛的“窃火”者	(62)
4. 《史略》、《考证》相媲美	(65)
(二) 鹄的参商之异	(73)
1. 交流切磋，各有所钟	(73)
2. “整理国故”的倒退与超越之争	(80)
3. 从疏离而至两极	(84)
(三) 同途殊归溯源	(92)
1. “期作圣”与“孺子牛”	(93)
2. 幻想者和苦斗士	(95)
3. 于中庸之攫否	(99)
4. 怀疑论与变革观	(100)
5. 取乎者异，行必歧矣	(102)

三、“实为公仇，决非私怨”

—— 鲁迅与陈源	(113)
(一) 现代评论派与《西滢闲话》	(114)
1. 现代评论派之功过是非	(114)
2. 平心说《闲话》	(117)
(二) 鲁迅与陈源论争始末	(124)
1. 站在执政府的一面和对面	(124)
2. “说理”与“喊打”	(127)
3. 真假“剽窃案”	(137)
4. 障眼术的破灭	(142)
5. 文艺观上见虚实	(144)
(三) 历史公案再评说	(147)

四、本是同根生，妍媸何轩轻

- 鲁迅与周作人 (156)
- (一) 同源异质 (158)
 - 1. 共求新声于异域 (158)
 - 2. “韧”与“乏”的分野 (161)
- (二) 兄弟反目 (167)
 - 1. 隙由铜孔生 (167)
 - 2. 怨自妇舌谤 (169)
 - 3. 为是寡义难识情 (172)
- (三) 分道扬镳 (177)
 - 1. 信念非则行迹异 (177)
 - 2. 水落石出自分明 (182)

五、“其即其离，皆出自然”

- 鲁迅与林语堂 (190)
- (一) 人生漫漫从头说 (190)
 - 1. 从莱比锡大学回来的博士 (190)
 - 2. “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194)
- (二) 相得相离皆有意 (200)
 - 1. “费厄泼赖”之拾与弃 (201)
 - 2. 危难相济，厦门情深 (205)
 - 3. 版税风波辨因由 (207)
 - 4. 《宇宙风》里的“幽默”经 (210)
- (三) 信仰异趣终生变 (221)
 - 1. “骑士”和“绅士”之集 (221)
 - 2. 南辕北辙穗与汉 (225)
 - 3. “脚踏东西文化” (227)

4. 啧啧微辞.....	(232)
(四) 同论国民别高低.....	(235)
1. 偏光镜下的《吾国吾民》.....	(235)
2. 踏着“铁蒺藜”前进的“立人”者.....	(237)
3. “园熟”四病.....	(239)

六、判若水火的人生追求

—— 鲁迅与梁实秋	(248)
(一) 论争的热点	(249)
1. “人格平等”两面观.....	(250)
2. 人性与阶级性.....	(256)
3. 翻译的“顺”与“信”.....	(264)
4. “乏走狗”之坐实.....	(268)
(二) 不同政见者的必然	(272)
1. 要马克思还是要白璧德.....	(272)
2. 弃物与至宝.....	(276)
3. 物性使然分枯枳.....	(279)

一、“历史中间物”

——在中外文化撞击中的鲁迅

“一切事物，在转变中，也总有多少中间物的。……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

——鲁迅：《写在〈坟〉后面》

“此所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

“为新文化开山”^[1]的鲁迅先生，甘愿作“桥梁中的一木一石”，一生为构筑中国现代新文化殚精竭虑。他以睿智的思想、广阔的视野、猛烈荡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积极汲取其健康合理的因素，对外来文化则广泛地“拿来”，有选择地“占有”，成为“五四”以后“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族手”^[2]。

(一) 鲁迅与传统文化

“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1]我们中华民族同样具有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鲁迅从童年开始就接受了士大夫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熏陶，由于民间文化的作用，鲁迅笔下出现了不少以民间传说、寓言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民间戏曲、谚语、俚曲等也常常融入他的小说、散文乃至杂文中，鲁迅对劳动人民、对民间文化的热爱之情和浓郁的民族风格均力透纸背，洋溢着革命民主主义的精神，这奠定了鲁迅无产阶级文艺观的基石。而对封建士大夫文化的清理和批判则贯穿于鲁迅的一生，同时，他又接受了其中健康和合理的因素，以形成鲁迅文化性格的一部分，即大无畏的彻底革命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鲁迅才能勇猛地剔除封建文化的糟粕，同时又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与渗透于灵魂中的封建文化的“毒气”和“鬼气”进行不懈地斗争，从而成为文化革命的先驱和旗手。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士大夫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而这种文化作用于鲁迅，又反映出十分复杂的状态，故下文便以此为重点，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

1. 儒家文化

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儒家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且占据着支配和主导地位。历代封建统治者打着“尊孔”、“崇儒”的招牌，无非是企图用它作为控制和统治民众，维护和巩固其专制政权的工具。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是“礼”和“仁”。古代的“礼”包括礼

节仪式、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等。孔子认为周礼是最完美的，一旦“礼崩乐坏”就得正名，即用周礼作标准来正名分，使君之实符合君之名，臣之实符合臣之名，父之实符合父之名，子之实符合子之名。“仁”即“克己复礼”，“克己”是约束、克制自己，“复礼”是把违反礼的言行纳入礼的规范。孔子还认为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仁应包括“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以达到缓和奴隶主贵族和奴隶日益尖锐的矛盾和阶级对立目的。孔子认为：要“克己复礼为仁”，就必须重视和强调孝悌的作用，在家孝顺长辈，入朝忠于君主，便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了。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主要锋芒是指向儒家文化的。在对儒文化的批判时，首先是批判儒学的伦理道德，他从“孝道”、“节烈”入手，揭露孔子主张的“礼”、“仁”的虚伪性和反动性。鲁迅猛烈抨击“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4]分析批判了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中那种“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的思想，更兼“其时‘人心日下，国将不国’”^[5]，“表彰女子节烈”乃是救国之法等一大套儒家学说的“三纲”之“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制度，指出“‘孝’‘烈’这类道德是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6]“郭巨埋儿”^[7]便是儒学伦理毒害民众制造出来的以亲子之爱交换畸形道德的罪恶。“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父亲要儿子死，儿子不得不死，实为“逆天行事”。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办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8]至于现在主张读经，他指出：那“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阔人只是以孔道为招牌，“读经不过是这回要把

戏偶尔用到的工具”^[9]，他们并不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实属“别有用心。”孔子极力恢复“周礼”，主张“克己复礼”就是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阻挡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他生前不受重用，死后却被统治者捧为“圣人”，成为“至圣先师”，道理很明白，封建统治者正是要利用他倡导的“忠、孝、节”的伦理制度，作为精神支柱控制民众，从社会到家庭，形成统治者永远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被统治者是丧失了个人意志和人格的奴仆，从而巩固和维护封建统治，阻挡社会向前发展。鲁迅洞察其实质，深刻地揭露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10]，“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撓”，^[11]在《狂人日记》中，又形象地揭示出“家族制度和礼教”“吃人”的本质，戳穿了儒家文化伦理制度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与孔子保守的政治主张紧密相连的思想方法是“中庸”之道，孔子认为处理各种矛盾时，应采用既不过度，又无不及，而要取其中的调和折衷的办法。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12]孔子教育弟子，交朋友要找持中庸主张的人，不得已时才与偏于积极进取的“狂”者和偏于消极保守的“狷”者交往。为避免矛盾的激化，他反对言行过激、过火。他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13]要求人们做个恪守中庸之道的君子，这样天下就不会大乱了。鲁迅反对“中庸”之道，主张积极进取的精神。他称颂摩罗诗派“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倡导“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启蒙运动，主张“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更是赞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

说，认识到只有靠暴力才能推翻腐朽落后的统治。血债必须用血偿还，请愿是不行的，必须要有火与剑。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14]是孔子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其保守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鲁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鲁迅早年曾有过“重个人而排众数”和“向庸众宣战”的思想。鲁迅当时认为大多数民众是愚昧落后的，但与孔子认为民众是不堪教化和愚顽不化的观点完全不同。鲁迅清醒地认识到国人的愚昧是统治阶级利用儒家文化毒害的结果，因此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是愚昧的。鲁迅认为这种智愚关系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就在他提出“排众数”的同时，便积极从事思想启蒙运动，以唤醒民众的觉悟。1925年后，鲁迅对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了新的看法，改变了早年唯心主义的群众观。他认为“世界是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15]1926年，他在厦门平民学校演讲中指出：“工农子女”穷的是金钱，而不是聪明与智慧，“贫民子弟一样是聪明的，一样是有智慧的。你们能够下决心，你们能够奋斗，一定会成功，一霎有前途。没有人有这样的权力：能够叫你们永远被贱役，永远有什么命运这样注定：要你们一辈子做穷人”。^[16]这样，鲁迅便有力地驳斥了孔子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教育观。

鲁迅曾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17]从总的方面看，鲁迅对孔孟之道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他毕竟出生在诗书仕宦之家，从小诵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思想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孔孟的影响，如孝道。鲁迅对孔子本人和对被统治者利用而作为治民工具的正统儒家学说看法是不完全一样的。因此在鲁迅的文章中也多处出现正面和侧面肯定孔子的

论述。鲁迅充分肯定孔子的进取精神，指出孔子的“祖述尧舜”是“欲以救世弊”。又称“儒墨都不满现状，要加以改革”，务“尽人力以救世乱”。认为“孔老相争，孔胜老败”的原因在于：虽然孔、老均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8]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为‘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19]孔子的这种以国事民生为己任的积极进取的人世思想以及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务实精神和顽强的斗争精神，不能说对鲁迅没有影响。鲁迅赞颂孔子“生在巫鬼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确是伟大”。还说：“报仇雪耻，《春秋》之义也”。这都说明鲁迅猛烈抨击正统儒家学说消极因素的同时，也吸取和发扬了其中合理健康的积极因素，一方面成为自己为民族解放奋斗不息的动力；另一方面，植根于民族的土壤，经过批判、扬弃和吸取的过程，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新文化。

2. 道家文化。

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始祖，庄子是道家学说的另一始祖。老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万物都是“道”的派生者。老子说：“道冲，而用之久不盈，渊兮似万物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20]他认为“道”这个东西，是空虚无形的，可是它永远用不尽，它十分渊深，好象是万物的祖宗。它虽是无形无象、似亡而实存，却不知道它是由谁产生的，只知道它在上帝之前就存在了。这个“道”是产生万物的本根、祖宗，是虚构的恍惚不定的精神本体。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本体和根源。在《大宗师》中，他认为道是有情有信，无形

无象，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却是可以体会到，它是自为本，自为根，未有天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道产生天地，使鬼神和上帝显示作用，它无始无终，无边无际，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个“道”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神秘不可捉摸的精神。庄子认为，产生世界万物的本体只能是非物质的，如果把它看成是物质的，就必然产生是非，引起争论，“道”的完整观念也将遭到破坏。庄子把“道”说成是一种脱离一切物质的神秘精神，从而把老子“道”的唯心主义观念进一步神秘化了。老子认识事物的方法是“静观”、“玄览”，即把内心打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象一面清彻幽深的镜子，做到内心清静空虚，世界万物自然会呈现在你的面前，你也就可认识自然万物了。在这种认识论指导下，老子说，只有做到“无为”，才能“无不为”。即，要实现精神上的彻底解放，达到无为的神秘境界，必须“一无所求”。庄子否认认识的客观标准，认为人的认识没有任何客观标准，一切事物的是与非的标准是不存在的，所谓是非观念是由人们的“偏见”造成的，而且认为根本不存在是非彼此的区别。于是他提出了“齐是我”、“齐彼此”、“齐物我”的观点，他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21]庄子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一样的，没有是非之分，若是要分是非，也是分不清的，既然如此，何必去自找苦吃呢？因此，庄子主张，应付无穷的事物，最好的办法是以不辩为辩，以不说为说，以不认识为认识。由此，最终便形成了虚无主义和绝对精神自由的“无己”、“无为”的人生观。当你被现实世界的是非、贵贱、贫富、生死、祸福等矛盾困扰，又受到客观物质条件限制和主观肉体的束缚，而产生精神负担时，庄子认

为欲求解决矛盾，则应采取逃避的态度，去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而真正自由的人，是不受自己肉体和精神束缚的。于是他提出要忘掉人世的一切，做到“无己”、“无为”，不感到外物和自己的存在。只有当这种人形同枯木，心如死灰，无忧无虑，无生无死，达到了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时，人间的是非、彼此、物我的界限也就都不存在了。庄子幻想超脱尘世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实际上是实现不了的。他便又提出了“不谴是非，以与世俗”^[22]的人生哲学。即人对任何事物都不置可否，凡事无可无不可，要随遇而安，安命处顺，对任何事都要不闻不问。道家学说虽然具有不可知论的神秘、虚无主义，但也不可忽视其间包含着的朴素辩证法的因素。

鲁迅对道家思想作了全面的评价，他既看到道家逃避人世，“无为之治”、“不撓人心”的实质，又认为老子有救世图谋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他说：“老子书五千言，要在不撓人心，以不撓人心故，则必自致槁木之心，立无为之治”。^[23]又说：“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仍欲治天下，其无为者，以欲‘无不为也’”。^[24]对于老聃，鲁迅也作了较为全面的评价，认为他既是“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又深有‘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战略”。鲁迅对于他的空谈，认为是不中用的，并无同情之处，而对他的韬略和战术也并无贬词。鲁迅对庄子否认认识事物的是非标准和取消事物之间有界限和区别的观点，认为比起老子的“无为”的确是走得更远，他“自无为而入于虚无”。^[25]当三十年代文坛论争激烈之时，有的作家不问是非曲直，悲叹文坛混乱，鲁迅指出：“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一定会有明明白白的是非之

别”。^[26]鲁迅明确对庄子的相对主义认识论表示了反对，同时也驳斥了“唯无是非观”的论调。对庄周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论，鲁迅虽然持批评态度，但同时也指出他并不是没有明确的是非观的。鲁迅说：“就是庄子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列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27]鲁迅正是看到了庄子可能正是无法实现自己所追求的是非观，才走向了另一极端，采用“无是非”来表现自己的“有所是非”。鲁迅在《故事新编》的《出关》和《起死》两篇历史小说中，形象地说明了老子“无为而不为”和庄子“无是非”、“无生死”、“无大小”的虚无主义人生观是无法实现的。的确，正统儒家学说处于衰败之时，在动乱的年代里，老庄哲学确实起到了慰藉和解脱人们精神苦闷和彷徨的作用。鲁迅曾说：“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在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28]鲁迅的人生历程中，经历过两次沉默时期。冯雪峰同志曾说：“在鲁迅先生的发展途中，也遇到过几次危机，很可能使他退隐于‘艺术之宫’或‘学术的殿堂’里去，而且也已经有过这样的退隐的时候。……辛亥革命后的一个时期，他曾经沉入到学术的研究里去，……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之间，他也很可能回到学术的研究上去”。^[29]1925年3月18日鲁迅与许广平探讨人生哲学时，他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偏激的声音。……（但）我终于不能证实：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所以我想，在青年，须是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亦自卫。”^[30]正如冯雪峰同志说，鲁迅很可能退隐，“退隐”自然是对现实

人生的一种看透后的所谓超脱的虚无主义，这里含有庄周“无己”、“无为”人生观的影子，然而如许广平所说，鲁迅“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31]成功地与自己灵魂中庄周的毒进行抗争，战胜了自我，抵御了退隐。显然，鲁迅的抗争过程，正是儒家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战胜了老庄的“无为而不为”的退隐思想。当然，除此之外，它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充分显示出鲁迅高于同时代知识份子的伟大思想家的战斗风貌和深刻的思想力量。

鲁迅对友人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流行。以此续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32]鲁迅称道教由周代燕齐派而来，“则多作空疏迂怪之谈”，“亦秦汉方士所从出也”。^[33]它吸收了道家消极无为的思想，并奉老子为教主。道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相当广泛，上至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和历代的官宦、士大夫，下到社会民间的老百姓都信奉道教。这是因为，道教是在中国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和民族特色，易于被中国人接受并广泛流传开去。道教追求的是现时的享乐和长生不老以及白日升天成仙后仍然享有的富贵荣华。况且它不同于佛教、基督教需要苦行修炼才能达到超脱尘世的苦难而抵达彼岸，它仅要求通过修炼方术，炼丹服药的途径便称可达到目的。其中不少方术，如作道场、巫婆下神、扶乩，降坛等在民间施行极为简便。道教正是适应了统治阶级以专制文化控制人们精神，迎合民众企图改变命运的心态，使之走向庸俗、愚昧、贫穷的边缘。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道教当然可以作为他们愚弄和麻醉人们精神的工具，但更为重要的是，道教与其它宗教有一个根本的不同点，那就是其它宗教几乎都